

譯

著

偏差行為研究：

譯者：黃維憲

社會病態學的觀點

譯者：黃維憲

黃維憲譯

社會病態學，曾經歷了一段起伏不定的知識歷程。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法國啓蒙時代時，善良的人的觀念。它主要的原則，乃是努力使社會行動能加入福利意識的科學行列。然而來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美國式陳述，則把社會變遷和人性的錯綜，解釋爲是個人失敗或失調。在當代偏差理論中，那些矛盾的持續（不論其如何使用語言上的修飾，而變成隱喻的或變形的），却使得病態概念得到了證明。但是因工業失序而引起的結構地失位（dislocations）問題，在偏差理論中，仍然大部分未被討論到。

把習慣上的符合道德行爲和不道德行爲（不被支持的行爲），與健康和疾病相對照後，社會病態學家便把社會秩序分爲兩部分，一爲社會組織，另一爲社會解組。社會組織部門指涉的爲，道德秩序是植基於，已確立的規範和制度的運作之中；社會解組部門，指的爲失道德秩序，它被想爲是與已確立的秩序之個人失位。而指出、描述和改正這些人性的失敗，就是病態學家的工作。

在十九世紀時，由於社會學、社會工作和社會改革的聯合，使得學術性社會學的主要任務，在於考慮病態現象及其改善。早期的聯合歷史，以及組織／解組分類的來源，是與美國社會科學的升降史相關。有關此取向的典型參考架構之主要構成要素的圖解可見下表。

社會病態學的構成要素表：

1. 社會——專業狀況：①工業化成爲主要的生活方式。②社會科學面臨了工業問題的解決。③精

英控制了工作。④社會學被視爲是一門社會改革的學問。⑤意識形態的思想。

2. 觀點：①社會達爾文主義。②社會抉擇，需要與工業部門相適應。③面臨新移民的融合問題。④都市下階層人士的被拒絕。⑤個人的失調或病態，被視爲是偏差。

3. 隱喻：以健康——疾病來指涉社會秩序和失序。

4. 主題：社會改正或改善的方法有三種：①臨床模式。②公衆意見模式。③公共健康模式。

5. 方法：個案法。

本文就以上述所陳述的要素來開始討論。我的企圖是在於，追蹤此早期工作的歷史和其概念的影響。

一、社會科學運動

一八四〇年在美國興起的社會科學運動，是把歐洲哲學和它對社會福利的應用，整合在一起的第一次努力。雖然改革和科學兩者，已使得慈善事、道德家和改革者相互結合，但它仍然是一個未分化的學術園地。此種新結合，相信社會科學在從神學過渡到現階段時，可提供一個科學眼光的有效策略。在此分析中，社會問題被視爲是，因爲過時的習俗，和政治興趣的持久不墜而產生的制度失敗。藉着理性的解釋和社會計劃而建構的科學社會，將可以代替巫術或神學的遺留物。

有三股思想源流，匯集於美國運動中，進而鋪設了社會變遷的藍圖。其中的兩者，包括着改革的

意識形態，另一者，很清楚地則是孔德的科學社會系統觀念。

第一個改革意識形態，是法國啓蒙傳統中的浪漫、烏托邦和新潮的觀念。它開始於理想人性本質的分析，着重於抑制和破壞它的社會罪惡。藉着演繹邏輯，提倡者提出了一套一致性、有效性和公正的社會系統。另一個改革意識形態，則爲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從拒絕大革命的宣言和計劃，它注重於具體和實際的變遷形式。社會和經濟立法、監獄改革、公共衛生和失能者的照顧和其他的改革計劃，是他們支持社會系統的構想。

不論上述兩傳統如何的分歧，它們實際上，已融合而爲此運動的意識形態的特徵。烏托邦觀念，明顯地是此改革混合物的一部分，雖然如此，但此兩者對於社會困擾的結構來源，却没有摸中系統的核心。這些混雜物的努力，使一位美國批評家，提出了下列的暗示：即只有在面對弊端的無精打采，能與它的積極支持和制裁相等的假定下，社會改革理論才能合法化。艾爾德（William Elder）在一八五九年時曾說，其解決之道，首要的要求，是所

有批評者都要知覺，社會變遷可以由人類的努力，來加以駕御。他說：

我們並不是那些拒絕理論者，乃是因爲它們的顯著的想法，似乎不實用，或是因爲它對於我們所維護的珍愛想法，加以重擊。但是我們仍然有很強的理由，使我們不能毫不遲疑地放棄革命的新產品，而認爲我們所生存的事物系統，雖不是完美的，但應該毫無意見地保護它，以抗拒所有的變遷。個

強的保守主義者，不應忘記他們反對所有改革的方案，事實上，牽涉到他們順從地支持所有罪惡的責任。但是假如真實的或假裝的慈善心，也被世人所拋棄，那麼這個世界也將沒有和平。此世界既不是很完美，也不是挺糟的……它是必須加以改善。此種必須改善的感覺，確實是來自任何人的每一似合理的改革談話；而這些談話，對於那些接受者，將形成要求的壓力，而不論其是否願意聽到或願意忍受……我們是一個有秩序的世界，爲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建議和檢驗那些願意訂定契約的所有成員所提的內涵。

藉着容納所有改革者的意見之方法，艾爾德舉出了改革地位的弱點。它是因爲缺乏社會的理論和活生生的政治結構的支持，在南北戰爭前的社會科學運動時期，僅僅是生產了少數有意圖的改革表，但它們却是無效用的。許多提倡者相信，社會改善必須具有來源於科學原理和原則所指導的改善社會之知識。而孔德的實踐學說和其新類型社會組織的計劃，便提供了學術性改革者，以人類較佳情況的理論基礎。

孔德新社會科學的基本要素，在於系統的關連，它曾經賦予很多早期社會系統建構者以生命。把社會科學做爲追尋理論的意識形態者，發現孔德的大規模社會秩序概念，是可以取代目前形而上和基督教化的社會秩序理論。遺憾的是，在孔德的思想中，天生具有假定社會爲整合連貫和統一的缺點。由於基於同質性和衝突利益的想法，使得他的想法沒有考慮到，工業秩序下不同社會組織的說明；從而

在解釋社會生活時，使得美國社會科學，不得不採取雙價值的邏輯形式。又被後來美國理論家所借用的孔德的社會結構概念，是調和有機的秩序，而偏離此秩序的狀況，就被稱爲非道德或病態。孔德思想主要的觀念，可摘要如後。

孔德推薦了四個學說，以做爲社會改革和社會理論的基石：即社會有機體模式、演進論、決定論和實證論。上述四者，在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的前提下，共同形成了一個社會的藍圖。孔德的工作中所隱含的假定和矛盾，可以部分地解釋，爲何早期美國理論家無法解決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福利理想和偏差形式的繁殖間之衝突的問題。

(一)孔德建議了一個生物模式的社會秩序。此模式認爲，社會就像一個生物有機體，它受到了生長、老化和變遷等法則的控制；而有機體結構，則是由道德、知識和物質等部分相互配合而組成的一個統一體。在社會有機體裏，則可透過部分間、部分和環境間的行動和行動回饋，而朝向一般目的，以達成功能和結構的和諧。在社會演進的最後狀態時，將是：

最後家庭、國家和教會將會分開，而且和諧地共存。雖然各結構與其他結構間，有一定的關係存在，但正如前文所說的，各結構間的奮鬥和侵襲，也是永遠不停的。

就孔德而言，有機體學說，不僅是一個有用的類比，同時也是一個實體。個人就像社會有機體，自己成爲一個小宇宙，但社會有其普遍法則，它是超越於心理的個人，也超越於個人的集合。社會變

成爲一架發動機，人類必須適應於社會的需求而調整其慾望。

(二)社會進化論，在解釋社會變遷爲自然現象時，大部分是依據於人類意志。從神學、形上學到現在工業科學狀態的機械演進的特徵，是與功能特化的增加和機體適應和完美的趨勢相呼應的。進步是建立於此社會變遷的絕對架構中，它可從人類能逐漸控制環境來得到證明。工業和制度化生活，展現出智慧和完美的增加趨勢。

除開文明智慧之形上學的進步階段之意見外，此架構尚有其他的基本泉源。然而把社會秩序視爲是一般屬性的進步，是缺乏特化的想法；同時，爲誰朝向何種目的和含有何種結果的進步觀念，也不會明確記載出來。此種在美國社會中佔優勢的神話和進步的思想，常被社會病態學者用來做爲生存和維持政治秩序的不公平奮鬥，而拒絕「事物自然秩序」的藉口。

(三)孔德堅持歷史決定論和進步變遷的必然性。雖然智慧方向可能加速其過程，但成長的階段是不能削減的；同時如缺乏變遷法則的認知知識，則將會妨礙其變遷的過程。從上推論，孔德強調，制度將會因社會發展階段的允許而日漸完善。決定論和有機體觀念的配合，貫串了孔德精心創作的社會改革設計。不幸地是，孔德的社會改革架構，由於不能從重建社會秩序中，得到理論的證明，因而只變成爲倫理和神學的一帖安慰劑。事實上，他也認爲，此自我節制的大社會系統之病態，必須要以新的道德來加以改正；個人態度的改變，是比社會結構

的更改，更爲重要。此想法也就是美國病態學者的決定論架構。

(四)實證論（即以科學法則來解釋所有的現象）被建議爲，可用來做爲代替宗教和形上學的解釋。實證論的內涵，是超越於在研究自制社會體的一組實驗手續。實證論是一個被理性、科學和道德教育等所控制的新的社會紀律。後者是經社會學家居中促成的；它們包括新的哲學王——僧侶在內。實證論藉着社會行爲之固定原則之教化，提供了節制社會系統的機械。當公眾意見變成爲社會的大節制器時，社會改革留給公眾意見者爲，藉着責任的溫和定義之替換，而減少了衝突和失序。但是孔德及其後繼的社會學家，忽略了強權和大公司的領袖，也常常會爲了其優勢階層，而操縱公眾意見。

孔德式的演進學說，配合上科學解釋而成的進步觀念，已融入美國社會科學運動，提供了改革者的組織原則。同時加上社會整體概念的理論工具的討論，使得早期改革的努力，包括了社會系統變遷的描述和計劃。而土地改革、合作事業和利潤分享等，則爲政治經濟變遷中的激烈奮鬥而得的例子。實驗殖民地的設立，在於說明社會科學理論的效用，努力於拓殖新社會疆域的殖民領袖，都以更新工業的烏托邦信仰，爲其最重要的旨趣。正如其中一位創始人所說的：

我們參加了人們所關心的大問題的解決之道，即人性中包括着各種興趣的問題。文明世界常受到衝突興趣的撼動，因此如何使用它和提高種族地位

，成爲了目前我們最大的工作；同時如果此工作得以完成，它將在世界歷史上佔一個很重要的紀元。假如我們證明了，在太平洋殖民所用的社會科學理論是對的；那麼我們將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系統中，推行更多的人性運動。我們應該認識，我們所從事的工作，是需要忍耐、勇氣和韌性，它在這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絕不能失敗。

此種實體躍進階段的母題 (flight-from-reality motif)，經濟失敗和內部派系等因素，却使得此運動轉弱，到最後這些因素也就從美國改革活動中逐漸地消失。

此外，實證論思想，對於美國社會系統建立者，尚有其其他的含意。雖然透過科學的社會控制，成爲了振興社會秩序的指導原則；工業化系統本身被視爲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節制此秩序過分時的解決之道，帶有強烈的喀爾文主義風味，它的建議是責任、克己和禁慾。但是其理論基礎，則是來源於孔德的社會系統概念：它稱讚社會超越個人，秩序重於自由，以及責任優於滿足；人權在此架構中，是被忽略的。有一個孔德的追隨者，名叫奧克斯奈爾 (James O'Connell) 者，曾經提出了如下的社會控制公式：

即理性代替了勢力，責任代替了權力，知識代替了愚笨，教育代替了迷信。簡言之，社會代替了個人。從而相應的策略，將是在財富和人口上的禁慾、自制和克己。

到了一八七〇年時，由於社會科學學會的分裂，使得社會科學的理論層面，溢出了慈善行爲的範

喘。同時慈善會議(The Conference of Charities)，以及其組織成員，刪去了學會計劃的一些應用的範圍；同時由於學術潮流的影響，學術訓練也就朝着相反的方向進行。

社會改革成爲一個分離的學科，而繼續朝着福利、精神病人的照顧、禁酒和女權主義等工作去進行。社會改革系統，促進了政府和私人救助代理結構的成立，此結構很快地使救助功能成爲了專業化。後來這些專業者，則與社會問題的心理學觀點之心理衛生運動相接合，從而社會個案法——即朝向失調個人和他或她的直接問題的描述——成爲了此園地的支配風格。現在此專業化主義，以個人對其社會情境的調適，和從改革變爲改善的社會工作之目的，已經非常完全。

做爲包括一切的社會科學運動的社會科學學會，所以會發生掙扎的現象，乃因爲它後來的專業化，產生了很多的新學科。新學科在十九世紀的後二十五年，因得到大學課程之正式的學術承認而各行其是，從而社會學遂成爲此運動殘餘的唯一收拾者，使得它發展成爲一門科學研究一般社會的學科。

烏托邦觀念，使得社會學家在掌握新社會和工業秩序的努力中，遭到了沮喪。與新生活形象相關的貧民窟、罷工、疾病、失業、移民勞工、信託和很多的問題，在大型系統建構者的改革計劃中，並不佔有任何地位。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爲改善貧窮移民情境的社會和應用原則的剩貨。

同時，開始於注重經濟重建的社會科學，在社

會問題上，也走向了特殊化，最後則沒入於社會學中。到了一八九五年時，社會病態學已成爲社會學的代名詞，此情形在大學的課程目錄中，可以得到證明。正如維沙學院的社會學課程的敘述中所提到的，它應包括下列現象的研究之提議即反應出此情形。它認爲：

社會學包括，自然抉擇、遺傳、環境和自由意等的社會學意義；變態的、生理的、道德的和社會的因素，以及貧困的統計；英國貧民法歷史，針對慈善、私人救濟、慈善機構、公衆救濟、救濟院、老年貧民和工人保險的原則。包括殖民勞工、流浪問題和依賴兒童等的失業救濟；疾病和精神救助；犯罪因素的統計，犯罪人類學，犯罪預防，犯罪處遇的管理原則，青少年犯罪，監獄方法的改革，累積判刑，家庭和離婚。

從而歷史哲學、社會學、社會問題和社會矯正學等，可以以社會病態學一詞概而括之。

是故，從事社會問題的從業者有二。一是社會工作者，他們嘗試使不適應的個人，能適應於勞工市場；另一則爲學術的社會病態學者，他們從理論上提供了，發生社會問題的原因之個人因素所在地。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則對於此社會秩序研究中的無法調停的取向，提供了意識形態和理論基礎。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社會病態學

最早使用社會病態學此名詞的教科書，是基於

有機體的概念，蓋與健康、正常社會相反的即爲疾病和不正常的社會情況。把社會病態學界定爲是，對於所有與社會最佳利益明顯的不一致，和清楚地是決定變態和不健康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可說是一個清晰可見的普遍偏見。貧窮、罪惡、生理無能和社會地不活動(social inactivity)等，常被做爲社會疾病的明顯徵候。與早先社會問題理想家相似的，他們也認爲個人病態的原因是來源於社會情境。或者就如有一本教科書所說的：

反應在個人身上的變態社會安排或功能，使得個人的退化和反社會行爲的產生有了可能，即使它不必然地是真實的促成它。

十年後，另一本著名的教科書，則放棄了社會情境架構，並且明言，社會病態學，爲社會關係失調的研究。從而此觀點，從注重社會情境(結構和功能)，轉移到注重反社會個人和他或她的失調的想法出現了。在美國有三個傳統，促成了社會問題中心理性取向(psychogenic orientation)的產生。第一個傳統是，孔德的社會學無法使社會問題和所謂高度秩序的工業社會之日愈完善相調和。社會病態學(社會系統的變態)，被貶謫爲遠離社會學理論的邊緣學科。社會組織模式，仍然被假定爲，是高度的整合，像有意志的一致性社會。中產階層的規範，構成了社會的標準；而偏離這些規範者，被視爲是個人的失誤，不是結構的錯誤。斯賓塞(Spencer)對於有機體概念的嚴謹使用方法，在美國社會理想家中，是很流行的，它也進一步地，對於社會問題的心理分析有所貢獻。在

斯賓塞的架構中呈現出，工業社會的複雜性是朝向大型化、凝聚、多形性和明確化等方向進步。從而使得工業社會的組織原則，例如志願合作和工業結構的集權化節制系統等，帶着自由市場概念，進入了社會學理論化的中心。從而藉社會系統的修補，以干預部分間的互相依賴，成為了美國斯賓塞主義學者的咒罵對象。個人的矯正，而不是社會系統的改造，可說是此自然系統命題的邏輯推論結果。

第三個傳統，是對於社會問題概念，有最大影響意義的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此信仰是受到商人和政府精英的大力支持。此主義是達爾文自然扶擇的高度扭曲的結果，它對殘忍的競爭和地位維持的持續，做了很好的證明。在它對於個人為生存而做的奮鬥所禮讚聲中，表示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贊成了現存社會秩序中高階層者所以能够生存的理由，乃是因為他們最能適應現存的道德秩序。而生存失敗者，便意指者，他有生物或社會的缺點，或者是對於競爭奮鬥不能適應的結果。

在它的理論層面中，達爾文主義把社會安排的失功能，解釋為進步的代價。社會必然向上和向前進步的意見，暗示着社會必須控制導致退步的社會力（即人們抵制變遷的力量）。社會改革，不僅要干預社會的正常運作，而且也要對不利於適應的事物，做最少的適應。孫末爾（Sumner）在一八八三年時，曾詰問達爾文主義一個問題：社會階層間的相互義務是什麼？而他的結論則認為，社會改革是藉着吵鬧、推力、纏擾不體和無能的力量之改

善，使得節儉、精力充沛和勝任的力量等蒙受不利。改革阻礙了進步，貢獻出回復到早期演進階段的故態，甚至退回到野蠻的時代。孫末爾說：「自然的社會成長，有其自己的建造時間表，社會工程師只是在重覆舊有的錯誤，他們常延遲了任何真實進步的機會。他認為工業系統是有其自動和自然的運作，不需人們的干涉。」在此段文字中所注重之點為：

社會最需要的是，避開愛管閒事者的干涉，而後我們就可回復到古語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狀態。吾人如把此古諺翻譯為率真的英語，其意即為，自掃面前雪，讓個人以其自己的方法自得其樂。假如一個人的行動和利益範圍與其他的人起了衝突，那就需要妥協和適應。吾人必須等待有利的機會，不要嘗試去概化那些干預，或為它們計劃一個實驗的前提。我們已有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是在權利調適的有利機緣下成長出來的。讓同樣的過程繼續下去……自然調適將……透過利益的扮演和團體間的志願讓步而達成。

由於自由放任主義成為了社會學的原則，從而社會病態學者遂集中其精力於認明貧窮、犯罪、精神病和其他的退化現象；而從此現象來尋求偏離人類生活的起始點，並進而辨明有那些原因促成此偏離，其中有影響因素是什麼？他們的目的，乃是在改進缺點，加強個人在經濟奮鬥中的工具，以使其不會違反了信仰或工業精英的實用論。在最適者生存的信仰之指導下，他們所界定的社會病態學之研究主題，即為依賴、犯罪和缺陷階層的控制

和處置。

三、社會病態學與個案技術

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社會工作、社會病態學和社會學三者，在心理性解釋、社會問題的重點和利用個案技術的融合下，是很難分清的。社會問題的標準教科書或處理法，是混合着個案史和他或她的問題之折衷式或解釋成份的要素在內。生物的、醫藥的、心理學的、心理分析的、經濟的和社會學的各種取向，提供了一本教科書所謂的，對於個人罪惡的「最均衡的解釋」(a well-balanced interpretation)。而問題個人的社會學地界定，則以危機、不適應、失調、失道德和解組等名詞稱之。個人變遷（如疾病、意外、喪失朋友和職業等）所造成的危機情境，則被視為是一個流行的心理分析問題。

(一) 個案研究取向有一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提出一種對失調者做詳細的描述之風格。它嘗試給學生聽眾以社會工作的觀點。福利案主常被形容為，是非理性的、失序的、無能的，社會地無技能的和暴戾的，而這些特質被假定為，是與低階層環境相關的行為，同時，此現象常常被戲劇化地渲染與誇大。在某一個有關困擾家庭的故事裏，作者以廉價小說的風格法，詳述了此家內的瘋狂行為。下列情景是，對於一個被其成員長久性的壞脾氣和暴行所威脅的不整合工人家庭所做的一段描述：

「他叫喊着，因此你就耽溺於拳擊和賭博，對

吧？然後他從真正的神經質和長久癖性中，說出了一個男人所能給與另一個男人的最粗野的謔話。卓約（Joe）像貓一樣地舉起了他的腳，並從其背後拿起了椅子，其他人也與他一樣地站起來。假如卓約是如其父所說的，則很明顯地，身受其害者即為其母親。這是一種超出於言辭之外的非難，在其妻子面前而言，這種從丈夫到兒子的暴行，可說是一種謀殺。當然尼亞克（Neck）先生並沒有此類的意思在內，雖然他和太太每天都會吵架，但他知道的很清楚，她是全心忠實於他和他的興趣。他的謔話，對於其孩子而言，僅僅是一種講話的姿態，是與其意義不相干的。尼亞克是疲倦和苦難的，而他的孩子似乎以一種怪的任性，使他透不過氣來。但是當困擾整天的他，看見他的兩個女兒，站在桌邊虎視眈眈，而背後的神經質妻子和兒子則似乎要拿起椅子擲他時，他整個的自制力都崩潰了。他抓起自己的椅子，毫無目標地向上投擲出去，結果在牆壁上造成了響聲，擊中了火爐的煙囪，煤灰遂散佈了整個桌子和三個尖叫的婦女頭上。

對於其無法選擇的現在，卓約有着由被害的自尊和憤怒所交織而成的盲目感覺。同時，他知道他母親是不會瞭解他對其父親所說的不公平的謔話而引起的粗暴憤怒之動機，於是飛撲過去，並把其父親的喉嚨按住於地板上。他是如此成功地就抑制了其父親，以致於使在桌子對面的尼亞克太太，感到不能忍受，而下意識地發出悲鳴。路易沙（Louisa）和梅（May）兩人，相互地遞過一個使人感到恐懼和厭惡的眼光後，路易沙盡其所能地攻擊

卓約的喉嚨，以期可以減輕其父親的痛苦；而梅則到廚房內，提了一桶水，並公平地潑在兩人的頭上。同時，由於吵鬧聲，使得鄰居都圍集在門外。一當梅看到煙灰和水，已經有效地毀壞他們的綠色拖鞋時，她聲嘶力竭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好像已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

一羣鄰人在哭喊中推開了門。卓約在新來者出現時，手已被凍涼了，於是他悻悻地舉起了他的腿站了起來，而在一些咕嚕和哼聲後，他的父親也作了相同的動作。梅在腦髓的靜默下，用肘推開了羣衆，衝入了街上。

她在街上召回路易沙，並說：「上述情況，就是昨晚我和那些魔鬼共渡的狀況。」

在此故事上添加的滑稽要素，使得社會工作病態學者（Social-Worker-pathologists）認為，為了案主的好處，他們是必須控制案主的。

（二）個案研究的第二個重點，是表列能够解釋失調個人或家庭的因素一覽表。使用米爾（Mill）的折衷式紙壺心理學（paste-pot eclectic psychology）的名詞來說，就是那些解釋的特性，是集中於尋找理想適應個人（如勤勞、特殊知識、一技之長、樂觀、熱愛工作、意志力和其他依標準個人良好生活所定的特性）所缺乏的特性。此適應個人是邊從中產階層的道德和動機，也參與於逐漸進步的可尊敬的制度中。同時，在使用小城鎮、中產階層環境的概念時，社會病態學者，常視社會地位不良者，為末社會化者。

社會病態學者從專業救助者借用了行爲的心理

性解釋和個案工作的社會工作方法。而準生物學名詞如適應或調適，則是與下列從流行的達爾文學說中與環境有關的名詞，如生存、遺存、適應者等有關連。此種調適概念的準生物和非結構特性，使得具有特殊地社會內容的學科黯然失色，而淪為僅是一種道德的評價；而且它通常也缺乏了定義界線，即使它被界定时，此概念也常常只是作者意識偏好的表示。

有時常態指的是，在常態生活中生命史的平靜無事，在其他時候，它則建議使用孫末爾的分析名詞「被遺忘的人」（forgotten man），或最近的說法「沉默大眾」（the silent majority）。常態標準可能也會被離居小城鎮，但未被都市變異所感染的理想中層人士所持有。正如艾利特（Elliot）和米利爾（Merrill）兩人對病態學者的解釋之討論中所說的：

所謂常態的生活，指的是平均中層階層的男或女人，有常態健康和生命史的平靜無事。這些人對於巨大財富從不屈服，他們也不會與貧窮、犯罪、罪惡和其他生活中的骯髒層面有過接觸。

就某些病態學者而言，常態是一個常識的觀念，以致於它一點也不需要加以分析。因而它是常與有機名詞，如一致性、均衡、和諧和穩定等相認同。在某些脈絡中，它常變成套套邏輯，即常態是常態，常態即常態。下列的定義方法，似乎與引起問題是連根而生的：

大部分而言，常態這名詞雖有着巧妙地界定，但它可正確地應用於有智慧人士的心靈中。用具體

化的名詞來界定它並不困難……就如普通定義觀念所傳遞的一樣，常態一字的意義，是指在整體組合中和所討論過的組織事物間的和諧——它是與常態因素相一致的。

不論常態是被界定的，或被保留於精心設計的原始名詞 (primitive term) 中，它含有臨床內涵，如健康、適應、心理的穩定、健康精神態度和習性，以及個人均衡等，則是很清楚的。變態則意指臨床地確定的規範之缺失 (the absence of clinically established norms)。除開偶然的分析外，大部分的病態學者，也認為社會變遷常常產生變態。然而因為社會結構概念的缺乏，變遷成了解組的同義字，而解組則又與個人失調同意義；以致於個人失調被廣泛地認為可包括整個階層和團體。是故，就此推理而言，社會問題可化為一個單純的論題——即調適問題。換言之：

所有的社會問題，是從此單純的社會問題中發生的——即人類對其宇宙和社會宇宙對於人的適應問題。而上述問題的失調，就產生了我們所有的社會問題。

從一方面而言，失調的概念，暗示着此社會是由一個屬於能幹的、中產階層的和成功取向的人們所組成的有秩序社會；另一方面則表示出，此社會中有與制度化的要求和目的不能調適的情形，以致於有不適應的現象存在。在改革者、社會工作者和病態學者的心目中，具有不適應現象的人，就是移民，從而他們被視為是社會解體、困擾和失序的潛在徵兆。移民問題是，最早被病態學者所重視的問

題，從而描寫此問題的有關概念，後來遂演變成了建構適應個人和控制失調的理想基準。如何使不適者能適應於一般的秩序，成為病態學者的主要論題，而其解決策略，則在於給與都市下層人士的法律和政治的參與。

四、改善——個人變遷的三種模式

病態學者為了處置失調者，認為恢復心理健康和用新倫理來改善社會關係的方法，是唯一能够解決社會失序的問題，而此高靈丹是曾被嘗試過，也曾被需要過。現代社會的支配制度已呈現出僵化的現象，只有沒有社會干擾的逐漸變遷，才能够保證其延續的外貌，因此新移民必須要能適應其新的環境。為了容納進入都市和工業規律化的社會的移民，病態學者認為，有三種個人變遷的方法可被使用：(1) 臨床模式，(2) 公眾意見模式，(3) 公共健康（預防）模式。然而上述三者改革模式所採取的可說是屬於策略性、具體性和片斷性的方法。做為非政治的想法，他們所談的，只是孤立的情境和他們的表徵；而不是經濟和政治脈絡下，如何產生個人壓力的原因。

(一) 臨床模式 (The Clinical Model)

臨床模式，由於其具有診斷和治療的取向，使得其在節制貧窮移民時，顯得非常適用。同時因為專業改革者和學術研究普遍地對於都市情況有了覺醒，從而反映出當時美國知識界的強烈鄉村式偏見的趨勢；此趨勢使得病態學者在讚美小城鎮美德的

同時，也認為城市的罪惡，是來源於墮落、腐化和貧窮等因素。未被融合的移民，因其帶着外國價值和民俗背景，也就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再者，因為對於外來者的普遍懷疑，遂肯定了政治行動，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勇氣，也助長了對移民生活方式的攻擊。

對於政府官員而言，立即的敵人只是政治上的大頭。而減低民族羣領袖的影響和美國化移民的問題，却反應出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和政策，從而重視心理適應的復健取向 (rehabilitative) 則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新的解決方式。在進步的改革者中，其基礎工作，在於控制使人羞恥的都市階層。那些階層是，被視為在道德上有問題而需要加以特殊預防和採用特別干預策略者。對於都市人口的不信任，已隱含於個人病態學的言語中，從而他們重視的是個人治療，而不是政治行動或結構的變遷。

臨床模式是把窮人當做疾病、傳染病、慢性病和需要預防等類型的病人來看待。干預和治療的計劃，牽涉到病人健康的恢復和天生缺點的改善。由於視窮人為不受支配、墮落、獸性和道德上有疾病的偏見定型 (Stereotypical images)，使得重型罪人性格的治療想法得到了支持。再者，道德病被認為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系統地探究病人的經驗是必須的，從而心理的個人主義成為了指導社會改善的哲學。

在二十世紀初期時，施雷 (Seeley) 的「無意識的美國化」 (Americanization of the uncon-

scious) 名詞，已在整個社會問題風潮中普遍地使用着。對於罪行的個人獨特性、經驗中的情緒因素和人格統一體系，以及需要對全人討論的兩件事，變成了人民救助 (people-saving) 機構和他們的社會聯合體的華麗目標之特徵。它也形成了個案工作的基礎，而案主的控制即為其主要的方面。

與普及制度對立者，就是視其為個人失調問題。柏蒂 (Platt) 曾描述出，藉着兒童救濟法和改革社會工作的興趣而成功地把其價值和規範，灌輸到無力的少數團體時，所使用的創新青少年犯罪的方法。此法並使得問題青少年的依賴地位得以保持。總之，弱人的照顧和治療，乃在於直接的靈魂解救，而不是對於制度的搶救。他們雖使案主對於其被剝奪的狀況能感到適應，但是對於權力不平衡的情境，則很少或根本沒有貢獻。

公共意見模式 (The Public Opinion Model)

就某些病態學者而言，個人處置法 (individual correction) 對於都市失序的阻止，是太慢和不適當的。他們認為只有道德教育才能產生啓發性的公眾意見，從而得以提高社會正義和恢復道德和政治平衡。社會結構在此分析中，雖不曾被忽略，但它却只有在問題的診斷時才出現，而在解決問題時，却又被除去了。工業化常被視為是問題的根源，因它引了許多新的疾病類型。在某一分析中，由於不能重建公民價值的緣故，使得改革主義暴露出兩個缺點，即想錯了和太單純。在對都市改革運動

，特別是女權運動的批評中，羅斯 (Ross) 曾指出，道德前導者 (moral pacesetters)，只敢對壞的個人習性挑戰；而對於壓迫重工業者、獨占的建立者和欺詐的銀行家等却不敢有所行動。羅斯曾替受到新動員的女權改革主義聯盟威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說下了列的話：

大多數男人比女人是錯誤的敵人。男人熱中於正義情況，女人則看到了慘狀。白人的、高尚的、正大光明的行動和正當的交易，是男性良心的表示。男性本能地感到，社會的精髓是藉着自製規則來調和的有秩序的奮鬥和競爭。實心眼男人會衝動地去抑制欺騙行為和骯髒的工作，那是社會秩序的可愛護衛。但是實心眼的女性之衝動就不是如此的。當她們以花朵塗成紅臂歹徒時，她們是反社會的；當她們參與無目的的罪惡運動時，她們比假社會 (pseudo-social) 者，並不會好多少。現在巨大的組織，已經對於百萬婦女的情操加以注意，結果目前已經產生了某些女性化的意見……。

然而羅斯也知道，無目的地玩弄個人和情境的危險性。他對於來自新控制團體的威脅之第一個考慮，是想以較正式的傳統控制和自生的團體壓力，來取代他們狹窄的階層利益。羅斯相信，不干涉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民主方式。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是植基於對公民的威壓，而是植基於公眾意見；它藉着道德權利的實施，而護衛了社會和平。同時他相信，階層、地位、喀斯特和政府的常態過程，已確立了有權的先例和傳統，它可壓制和節制新進者。再者，常態社會過程，終會正常的工作，是故我們並不需要採用特別的社會控制方法。

有教養人民的利潤，常被病態學者視為是現代生活中，增加社會控制的有害影響之一帖解毒劑。在他們的眼中，公眾意見表示出目前的社會緊急事件。然而因為人民信任它、畏懼它，從而被它所纏住，是故它必受到順從。唯一的備選方法，則是對於否定個人自治的社會秩序，要加以抑制。有些作者認為，社會節制已經走過頭了：

在文明社會中，法律和節制，在個人的每一方面都產生壓力。不論何時，只要一個人嘗試去產生超出破壞平凡生活的水準時，社會推進器 (Social Screw) 自然地會開始其工作，而使得他遭受到龐大的社會靜態壓力……在此巨大的社會靜態下，以及經濟、政治和宗教的節制壓力下，個人在其生活中，沒有為開始其決定的可能，也沒有為其移動、生存和自由的思想的可能。個人自我沉淪了，可敬化的、潛意識的、社會的和非個人的自我，浮現於表面，從而它受到了訓練和教化，結果變成了所有歷史生活中的行動者。

一致性公眾意見的秘思，將抑制了反應的力量。桑德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在對於羅斯懇求以權利的一般意義，來對抗僅是利益權利的建設性想法的讚美之一封信中指出，精英已經發現公眾意見的概念是一個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就如羅斯福在結論所說的：

你拒絕了大部分社會主義的害處。換言之，進步將在階層奮鬥中才能得到。你堅持，假如它只要具有充分的創意和覺醒時，所有健康心靈的愛國者，也將會堅持；則公眾意見便與必須的更生工作相一致，它將成為未來的支配者。你的書是健全和穩健的，我相信它的影響會非常的普遍。

做為改善設計的公眾意見模式，是拒絕社會重建和根本的改革。而對於許多被剝奪的都市人口之改善，只有在他們的正常教育和融合於中產階層

倫理的增加後，所產生的巨大變遷中才會發生。

(三) 公共健康模式 (The Public Health Model)

公共健康模式的改善，是嘗試透過社會罪惡的預防，以遏阻社會失序。從檢查制度做為社會失序的發生原因而言，它是比臨床或公眾意見取向，來得更進一步。都市組織是超越個人集合，並佔有一個的既定區域，從政治經濟而言，在都市裏，集結有多種形式的工業組織，受經濟政治利益所支配的資本主義，只能對少數人有利；反應遲緩的共同體和科層制度結構，才被視為是可以破壞社會並繁殖道德和生理疾病的處所。

透過預防來解決社會問題，是公共健康模式計劃的一部分。一當疾病已被認定，它的負債主也被詳加敘述後，大眾處理計劃，便會跟著而來。為了要減少疾病負債主，此計劃被迫必須灌輸健康觀念給其成員，以便對抗疾病，說明個人去改變其行為。預防取向嘗試變更的，只是一個單一的制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間各制度相互關係的系統性。針對遷徙勞工所做的貧民窟淨化、反托辣斯法、社會保險、公共教育和個人訓練等，只能說是此計劃中的一個計劃。

最重要的是，病態學者是為中產階層的多難社會而工作。依照他們的取向，工業衝突和貧窮的廣泛，使得階層產生分裂，遂逐漸地損壞了民主根基，從而給與激烈變遷乘隙而入的機會。根據某些病態學者的意見，如能延伸自然人權概念，而使工人和中產階層相似時，公共和私人改革，將可防止革命的恐怖根源之侵入。階層意識和階層同化，將會日益增加；資本主義必須加以改革，否則將會被破壞。如能使工作階層的機會擴大，並在主要制度中，加入生動的倫理，並使財富的分配更加公平，則現行系統地可以繼續地維持。故唯一的備選方

法將是社會主義。在對中產階層的評論中，有一病態學者在表列了社會不穩定的原因和治療後，結論地說，基本形式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他說：

前述的改革，以及其相似者，將榨乾了我們社會領域的泉水，以致於使社會主義無法成長。但是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假定以頑固和有攻擊性的態度，去反對此種改革時，則其行為將是全然地自殺性的愚蠢行為。假如中產階層在面對發生於其四周的事件，採取的態度是自以為是、盲目和忽視的冷淡，則無異於愚蠢的自殺，那麼它如何能够加以預防呢？

公眾意見和預防取向兩者，皆包括着社會問題的不切實際的解決方法，從而使得它們不可避免地要回頭到，以個人病態和矯正為主要方法的改善策略。既不是政治權利，也不是社會學理論的階段狀態，能單獨地支配一個能滋潤社會秩序模式。因而社會達爾文主義，仍成為支配性的風尚，它是把社會變遷解釋為生物上的劣等性；而對此變異的心理學解釋，只能被視為是，對於制度化生活的不適應者之一種教化技巧。

五、結語

早期美國社會學者，因不能有效地概念化變遷的社會秩序，以致於在其思想家中常表示出，反對都市和中產階層價值的偏好態度。而未受挑戰的價值也出現在文獻裏，並且在學術界和改革者中，永垂不朽。他們創造了，社會像一個有秩序和健康的有機體模式之想法，而此有機體是可與個人解組和疾病的特徵相提並論的。

從個人問題的矯正改善之重視中，社會病態學者以老式的社會組織形象上，建立了一個應付社會問題的鬆散範式。把異質性、變異和變遷等新工業秩序的基本要素，視為是社會的問題，遂使其理論基礎，喪失了停泊處。在他們早期的工作中，社會

病態學者的一致性價值觀，可從下列三種途徑中窺視之。

(一) 社會病態學者所採用的社會組織模式，可說是小城鎮景象的放大。良好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初級團體的親密性和同質性的瀰漫，社會變遷在逐漸和有秩序的潮流中發生，公民都能對它感到適應、親切和有用。依照此有機概念，社會在時光流轉中，和諧而連續地生存下去。

(二) 社會病態學者所使用的社會解組觀念，常常指的是，與上述所描述的有機社會的缺乏。社會問題的界定是依據人們對於既存規範的偏離程度來認定。都市化、移民和其他型式的變遷結果，常使得某些人不情願地或不能趕上水準，從而發生了社會問題。而較多和較好的社會化，對於問題個人以及因社會變遷而反應出來的變形是最好的治療藥物。

(三) 價值觀的一致導致了同一類型的社會組織和解組觀念，決定了教書的問題選擇和組織的標準，同時也決定了社會學的分工原則。為學生聽眾所寫的社會問題教科書，其特徵是維持於，如米爾氏所謂的「為了維持一容忍常識水準的教科書」(a textbook tolerance for the commonplace)之低度抽象的程度。從而使得偏差行為和社會問題的課程，具有暢銷式的吸引人。然而就整體而言，它們與整個社會學園地中的大理論是很少有關連的；他們所呈現的，只是一組孤立的情境和由片斷不相關連的文章所彙編而成的形式。至於社會問題的教學，全然地是以常識的程度來進行。

本文譯自 N. J. Davis 所著的 *Sociological Constructions of Deviance: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in the field* 一書 P. 14-33, *Deviance as Individual Disorganization and Amelioration: The Social Pathologists*, 1975, W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s, Dubuque, IOWA, U.S.A.